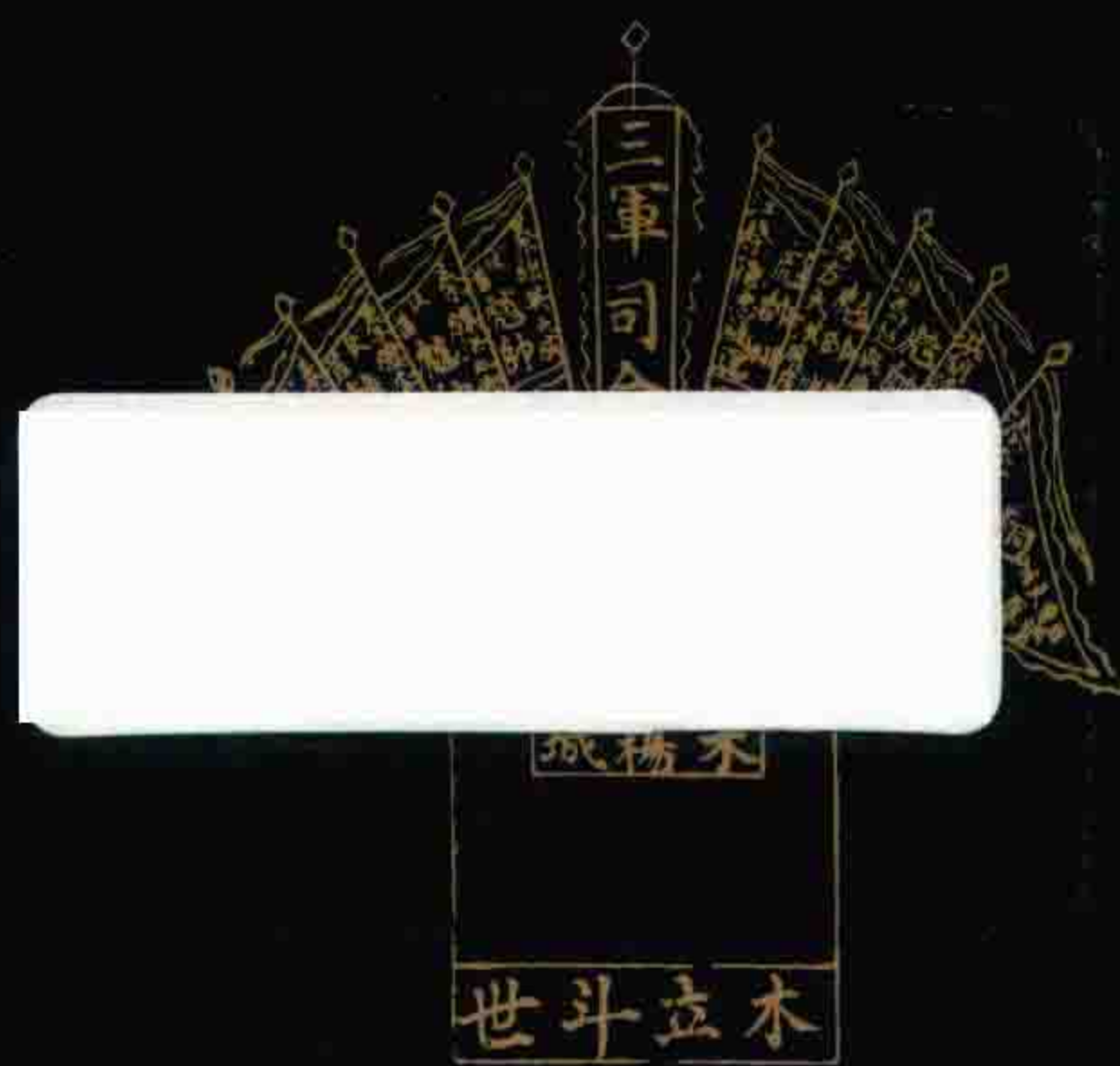


# 中国 秘密社会史

(修订本)

〔日〕平山周 著



创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 中国秘密社会史

(修订本)

[日] 平山周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创立于1897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秘密社会史 / (日) 平山周著. — 修订本.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ISBN 978-7-100-15410-9

I. ①中… II. ①平… III. ①帮会—史料—中国  
IV. ①D6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243856号

权利保留, 侵权必究。

中国秘密社会史

(修订本)

(日) 平山周 著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5410-9

---

2017年12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张 7 3/8

定价: 48.00元

# 研究中国秘密社会史的开山之作

## ——读平山周的《中国秘密社会史》

秦宝琦

平山周所著《中国秘密社会史》，是一部有关中国秘密社会历史的重要著作，1912年（民国元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截止到1927年，已经出至六版，足见其受欢迎之程度。一百年来，有关中国秘密社会史的研究成果大量涌现，但是，这部书在学术史上仍占有重要地位，至今仍为治中国秘密社会史者所必读。

在清代的语境里，均没有“秘密社会”的概念，相关组织或者被称为“邪教”，或者被定性为“土匪”，学者更对之不屑一顾。所以，最早研究中国秘密社会历史的乃是一些西方殖民当局的御用学者。在19世纪的东南亚，华侨、华人中的秘密会党给西方殖民当局造成了不少麻烦，一些御用学者为了帮助殖

民当局了解华人秘密会党的内幕，以便于打击，便着手搜集华人秘密会党活动的情报和会党的秘密文件等，发表了不少论著。马六甲（Malacca）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院长、英国人米怜博士（Dr. Milne）于1826年在《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学报》（*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ian and Ireland*）卷一，发表了论文：《一个名为三合会的中国秘密结社》（“Some Account of a Secret Association in China Entitled the Triad Society”）。把三合会称作“秘密结社”（Secret Association）。英国人纽堡（Lieutenant Neubold）于1841年在英国《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学报》卷六，发表论文《中国秘密社会：天地会》（“The Chinese Secret Society of Tian-ti-huih”），把天地会称作“秘密社会”（Secret Society）。

西方殖民学者所说的“秘密结社”（Secret Association）或“秘密社会”（Secret Society），实际上仅仅是指天地会或三合会，并不包括会党中的哥老会、青帮等组织，更不包括秘密社会中的白莲教等教门。有的著作虽然提到白莲教，但把它误认作是天地会或三合会的分支。把会党与教门加以正确区分的，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党人陶成章，他在《教会源流

考》中，把中国的秘密社会分为会党与教门两大系统，但陶氏主要讲述“教”与“会”的源流，意在为“民族革命”的理论寻求历史依据。而平山周的《中国秘密社会史》，则不仅把会党与教门加以区分，并且作了系统、概括的论述，从而确立了该书在学术领域的地位，可谓研究中国秘密社会史之开山之作。

平山周的《中国秘密社会史》原本并非学术著作，而是上报给日本外务省的调查报告。平山周于1870年出生在日本福冈县，早年投身于日本著名政论家犬养毅门下。清末，日本政府看到清王朝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中，出于未雨绸缪的考虑，由外务省派人到中国来调查反清势力的情况，犬养毅便推荐他的门生平山周担任此事。平山周为此首先设法找到孙中山等中国的革命党人，并成为孙中山的密友。之后，平山周又进一步调查中国下层社会反清势力——天地会、哥老会、青帮的情况。他在调查会党的过程中，借助于革命党人的帮助，接触到会党的诸多首领，从他们那里不仅了解到会党的反清事迹、组织状况，而且搜集到不少会党内部的秘籍。

平山周对中国会党的调查，是同中国的革命党

人、维新派激进分子一道进行的。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和维新派激进分子均需要联络和利用会党，为己所用。

革命党人要求以武力推翻腐朽的清王朝，但是手中又缺少必要的武装力量，这就需要团结和联络会党这个现成的组织来进行武装斗争。因为二者在“反满”这一点上具有共同目标，而会党所进行的很多次反清起义，更给予革命党人很大的震动。同治五年（1866），广东惠州府宁山地区的三合会起义，使孙中山先生受到很大的鼓舞。他说：“中国人已经有了相当的觉悟，还存在种族的团结力，遍布华南的三合会和各地的绿林，也蕴藏着反满的潜力。”<sup>[1]</sup> 维新派激进分子同样需要联络和利用会党。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梁等人曾打算利用广西会党的力量起兵“勤王”，建立“帝党新政府”<sup>[2]</sup>。为此，他们派人来到广西“运动会党为己用”<sup>[3]</sup>。维新派

---

[1] 陈列、钟珍维：《孙中山与会党》，《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4期。

[2] 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6页。

[3] 《孙中山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5页。

的骨干林圭为了组织自立军，还亲赴广西“纠集会党渠魁”<sup>[1]</sup>。

总之，当时无论革命党人还是维新派激进分子，均需要利用会党来反对清朝统治。要联络和利用会党，当然就需要了解会党，于是就有了革命党人和维新派激进分子对会党进行调查与联络的联合行动。

光绪二十五年（1899），孙中山派兴中会会员兼哥老会首领毕永年前往两湖一带对哥老会进行调查与联络。恰好平山周也受日本外务省的派遣，来到中国调查哥老会等会党的情况，因为平山周同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有着密切关系，毕永年遂偕平山周同行。毕永年在汉口又邀请到湖南籍友人、维新派激进分子林圭，三人一同赴两湖进行调查和联络哥老会。事毕，毕永年和林圭二人分别向孙中山和唐才常作了汇报。平山周对孙中山说：“所见哥老会各龙头多沉毅可用，永年所报告全符事实。”孙中山根据这个报告，作出联络会党“在湘、鄂、粤同时大举”的决策，并令毕永年两次内渡，偕哥老会各龙头赴香港谒陈少白、杨

[1] 《辛亥革命》（一），《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30页。



衢云等，商量与会党的合作办法。维新派首领唐才常也根据林圭的汇报，于光绪二十五年夏秋之际，与林圭、秦力山商量，“拟于长江沿岸利用会党举义，借以夺取武汉以为基础”，进而举行推翻清朝的武装起义。平山周回到日本，则向日本外务省提交了调查报告，其主要内容便形成了后来的《中国秘密社会史》。

《中国秘密社会史》一书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书中保存了大量会党内部的资料，在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中国的秘密社会（包括会党和教门两大类秘密团体），在清代均属于“非法”组织，天地会、哥老会等会党被清朝当局定性为“会匪”或“土匪”，青帮被称为“枭匪”；白莲教等教门被定性为“邪教”或“教匪”、“邪匪”，在《大清律》“刑律”的“贼盗·谋叛”部分，均专门列有对之惩处的条款。因此，它们只能进行秘密活动，其事迹也鲜为人知。为了安全，会内的一切活动和秘籍（帮规、戒约和誓言、腰凭等），均严加保密，“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子儿女”，所以很少有文字记载流传下来。即使有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来的秘籍，也因会党的分散性而互相歧异，这

也更加突显了《中国秘密社会史》的史料价值。正如章炳麟在为该书撰写的序言中所说：“日本平山周游中国久，数与会党往复，于中国之秘密结社，汇面志之。盖其情伪纖悉尽知之矣！余念会党各为部伍，符号、仪式所在互异，其人往往不相闻知。今欲集合会党，非直因成法利导之也，又将参而伍之，去其泰甚，补其缺遗。不有是书，将何以遍照哉！”诚如斯言。在清档和官书里有关秘密社会的资料，几乎全是官方打击、镇压秘密社会的奏折和少量被俘、被捕者的供词。所以，平山周在《中国秘密社会史》里所保存的秘密社会资料，如天地会的会规、誓言、入会仪式、联络方式、会内秘籍、造字方法以及腰凭（会员证）等；哥老会的开山堂、开香堂的情况，首领等级的名称、入会仪式、会内秘籍、拜码头以及帮规、誓言等，也就弥足珍贵了！书中许多内容，被民初的徐珂全文辑入《清稗类钞》。民国年间的一些帮会中人的著作，如刘联珂的《中国帮会三百年革命史》，朱琳编著的《洪门志》中有关天地会、三合会历史的叙述，多采自平山周的《中国秘密社会史》；戴魏光所著《洪门史》的相关部分，虽然采自徐珂的《清稗类

钞》，而后者的内容全部来自平山周的《中国秘密社会史》，可见该书影响之大。即使是专业的史学家，也把该书作为重要的史料加以使用。

当然，平山周并非专业的历史学家，而且受到当时史料缺乏和研究水平的限制，书中有关中国秘密社会历史的记述，难免有舛错或不确之处。限于当时的排字和校对水平，也出现了不少错别字。我们无意苛求前人，但为了让读者对中国秘密社会的历史有正确认识，在该书重新出版之际，有必要对书中的明显错误或不确之处加以订正。对于行文中的错别字，均加以注明，供读者参考。

## 关于白莲会

《中国秘密社会史》里首先讲到的是“白莲会”。在中国的文献史料里，宋元时期的史料中所称“白莲会”，在明清时期均称作“白莲教”。故作者所称明代“天启五年，白莲会蜂起”（第7页）；清代乾隆四十年“白莲会首”刘松（第7页）云云，均不够准确，因为

明清两代无论官方还是白莲教自身，均已经不再使用“白莲会”之名称。

作者提到“白莲会”始于元末，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但“白莲会[教]”并非作者所说由韩山童祖父所创（第6页），而是由南北朝以来的几支佛教端教派，包括弥勒教、白莲宗、白云宗等，在民间长期流传过程中逐渐融合而成。

书中所称“蓟州王森者，得妖狐异香，创白莲教”（第7页），亦欠妥。王森所创乃“闻香教”而非“白莲教”。书中提到，嘉庆十八年袭击紫禁城事件为天理教所谋划是正确的，而所称“白羽会、三香会、八卦教等，咸归向而赞助之”（第8页）。其中“白羽会、三香会”均未见于史料记载，不知其所据。所述“此变首谋者，系河南李文成，山东林清二教徒所为”（第8页），则不确。李文成确系河南滑县人，且在河南活动。而林清则是京畿大兴县黄村宋家庄人，主要在京畿和直隶固安等地活动，虽然去过山东，但同山东关系不大。又称“九月十六日，林清饰其党二百余人，为农夫，潜自宣武门入内城”（第9页）亦不确。档案史料记载，林清系从140多名教徒中挑选了70余

人，从京畿大兴县黄村出发。来到北京后，在菜市口会齐，经崇文门来到前门外，然后分别进入东华门与西华门，<sup>[1]</sup>而非书中所称从宣武门进入内城的东、西华门。书中所述天理教徒事败后欲纵火焚烧“崇文门”亦误。崇文门并不在紫禁城内，史料记载天理教教徒欲纵火焚烧的是紫禁城内的“五凤楼”而非紫禁城外之崇文门。所述“林清匿北京数里外之黄村，候进止。且冀山东、河南党蜂起为变也。适有黠慧之太监，探知林清匿黄村，驱车逆之，诡贺其事之成。伪谓宫已破，急待首领之至，议进兵计。林清信其言，偕驰北京”（第10页），然后被捕。此说颇具戏剧性，然不符合实际。事实是：林清在派陈爽、陈文魁等率教徒进京造反后，便留在大兴县黄村宋家庄家中等候消息。造反事败，清吏从大量被捕教徒口供中得知此事乃林清策划，遂派人至黄村宋家庄逮捕林清。十七日清晨，林清及其外甥董国太被拿获。<sup>[2]</sup>据董国太供：“十五日早上，我舅舅出门一次，早饭后回家，叫我们打钹吹筒，他打鼓板。晌午后，他要睡觉，吩咐我

[1] 《陈爽供词》，《故宫周刊》第203期。

[2] 《军机处录副奏折》托津等折，嘉庆十八年九月十八日。

们说，‘若有人来就叫醒我’。起灯时，他醒了，叫我们各自睡去。十六早上，祝林们回来，同他说了几句话。他闷坐着，吃了一日的烟。到晚上，叫刘福受们打更，并说，倘有人来，即刻告知。十七黑早我起来出恭，见官人将他拿住，官人见我就一并拿住了。”<sup>[1]</sup>

有些属于笔误或排字错误。

第10页所称：“杨遇春至卫辉，即自率亲兵八十，由运河西进，窥道口。”此处亲兵“八十”疑系“八千”之误。

该书第12页作者所引那彦成奏折，有多处错别字，疑系排字错误。第一，“滑县闹事三人，俱系震卦教”，原文为“滑县闹事之人，俱系震卦教”。第二，“林清党多系坎卦教，凡在教者，均称为北方上坎宫孔老爷门下，其孔老爷系首先传教之山东宁县人孔万休，亦已于王中案内正法”。其中，“北方上坎宫孔老爷门下”，原文为“北方元上坎宫孔老爷门下”，缺一“元”字；“山东宁县人孔万休”，应为“山东宁阳县人孔万林”。第三，第11页，“直隶总督章照”乃

[1] 《董国太供词》，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张煦”之误。第四，第12页所称：“又讯有清门教，系滑县人王正纪所传。当时拿获办理，讯系兖州石佛口王姓分支。”文中所称“清门教”，乃“清茶门教”之误，“兖州石佛口王姓”，乃“滦州石佛口王姓”之误。“青县李八、叶福明等”，乃“青县季八、叶幅明等”之误。“祁州那士魁”乃“祁州邢士魁”之误。<sup>[1]</sup>

## 关于天地会

在天地会一章里，作者把他在调查时搜集到的有关该会缘起传说——少林寺僧征西鲁有功，反遭朝廷残害的故事，抄录下来载入书中，成为我们研究天地会起源问题的重要史料之一，民国初年被徐珂辑录在《清稗类钞》中。平山周鉴于该文件乃一传说故事，故提醒读者：“其传说多荒唐无稽”（第19页），“姑据所闻述于此，至其谬处，识者当自能辨之也”（第28页）。这个态度是严谨的，不似某些西方学者，直接将该故

[1] 见（清）那彦成撰：《那文毅公奏议》八十卷，《那文毅公初任直隶总督奏议》卷四十二。

事当作天地会的真实历史加以叙述。迄今国内外保存的天地会秘籍《西鲁序》有多种版本，核之各种版本，平山周所引用的内容，亦有错误或缺漏之处。第20页称郑君达乃少林寺“勇武绝伦”之僧人，而多数版本中，郑君达并非少林寺僧人。<sup>[1]</sup>从该书第23页所述郑君达有妻郭秀英，并有子郑道德、郑道芳等情况判断，可知郑君达绝非僧人。第22页之“吴廷贲”，多数版本均作“吴廷贵”。第22页所称“达尊”，多数版本均作“达摩”，该书第28页亦作“达磨”。该书第25页之“文廷国式”，多数版本均作“天庭国式”。第27页之“苏光”，乃“苏洪光”之误。“黄丞思”，乃“黄承恩”之误。

## 关于三合会

作者把天地会与三合会作为两个平行的会党分别

[1] 刘联珂的《中国帮会三百年革命史》、朱琳编著的《洪门志》及戴魏光所著《洪门史》中有关郑君达僧人身份的说法，均来自平山周的《中国秘密社会史》。而天地会秘籍《会簿》，如萧一山辑录的《近代秘密社会史料》、罗尔纲辑录的《天地会文献录》中的记述中，均未将郑君达作为少林寺僧人。



在两章（第二、第三章）来叙述，似无必要，因为三合会乃天地会之分支别名。书中述及乾隆五十二年台湾林爽文起义时称：“林为彰化县大理村人，系三合会大头目。数十年间，土民多党于三合会。”此说亦欠妥。因为乾隆末年台湾林爽文起义时，尚未出现“三合会”这一别名，“三合会”的名称最早出现在嘉庆年间；林爽文系彰化县“大理杙村”而非“大理村”人。所称“数十年间，土民多党于三合会”亦不确，因为天地会是乾隆四十七年才由福建平和人严烟传入台湾的，距离乾隆五十一年末林爽文起义的爆发，仅仅四五年时间，而非“数十年”。在述及起义过程时所称“忽此事为大吏所闻，即飭总兵柴大纪率军三百剿捕”亦不确。当时台湾仅仅是福建省的一个府，最高文职官员是知府，最高军事长官是总兵。台湾当时没有比柴大纪更高的“大吏”可以“飭总兵柴大纪”去进剿起义军，而且总兵也不可能仅仅率领区区三百名兵丁前往剿捕。实际情况是：当起义军准备攻打彰化时，知县俞峻恳请总兵柴大纪前往镇压，而柴大纪却以调兵为名，返回府城，仅派游击耿世文率兵三百，会同台湾府知府孙景燧前往。